



文学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姚永朴

文学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文学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

姚永朴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姚永朴:文学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 / 姚永朴著. —
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5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小北主编)
ISBN 978-7-5581-0852-5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
究②史学—研究方法 IV. ①I206.2 ②K0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7924号

姚永朴:文学研究法 史学研究法

著 者 姚永朴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王昌凤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×1000mm 1/16
字 数 187千字
印 张 12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010-63109269
发行部: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0852-5 定价:2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文学研究法

- 文学研究法卷一 / 3
- 文学研究法卷二 / 39
- 文学研究法卷三 / 73
- 文学研究法卷四 / 111

史学研究法

- 史 原 / 147
- 史 义 / 153
- 史 法 / 159
- 史 文 / 165
- 史 料 / 171
- 史 评 / 175
- 史 翼 / 181
- 结 论 / 185

文学研究法

文学研究法卷一

起 源

昔《尚书》帝典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《诗·关雎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、动天地、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朱子（熹）《诗集传序》云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；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；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，此诗之所为作也。”然则文字之源，其基于言语乎；言语其发于声音乎；声音其根于知觉乎。大凡盈天地间者，皆物也。物之号有万，其由气而凝为质者为矿物，有生意者为植物，有知觉者为动物。动物之中，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气而最灵。故鸟兽虽有知觉，而狭而不广，偏而不全；人则既广且全，广故大，全故周。自堕地以来，即呱呱而泣，盖已有所欲矣；继而解笑，又继而解言；至能言而思无不达、求无不遂矣。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；且人与人之欲，亦可以相为感通。然而能宣之于覩面者，究不能推之于万里，是行于近而隔于远也；能著之于一旦者，究不能求之于

百年，是通于暂而滞于久也。使终古如斯，将思之达者仍有所不达，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。有聪明睿智者出焉，于是作书契以易结绳之治，百官以理，万民以察。盖至是而人类之作用乃益宏，文字之功效，乃不可胜数矣。昔扬子云（雄）《法言·问神》篇云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”徐伟长（干）《中论·贵验篇》引子思云：“事，自名也；声，自呼也。”孔冲远（颖达）《尚书·序·疏》云：“言者，意之声；书者，言之记。”韩退之（愈）《送孟东野（郊）序》云：“人声之精者为言。文辞之于言，又其精也。”程子（颐）《语录》云：“凡物之名字，自与音义气理相通。天未名时，本亦无名，只是苍苍然也。何以便有此名？盖出自然之理，声音发于其气，遂有此名此字。”然则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，人声之形象寄于点画，点画之联属而字成，字之联属而句成，句之联属而篇成，文学起源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

粤稽“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”（《易·系辞下》），又“因而重之”（《系辞传》），为六十四卦。盖天地万物之情状，已隐然括于其中矣。及黄帝时，史臣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，乃造书契。其初但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而谓之字；著于竹帛，则谓之书。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教国子有六书，所谓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是也。许叔重（慎）《说文解字序》云：“指事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二二是也（二二即上下）。”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屈，日月是也。”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”“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武信是也”“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”“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云：“六书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”大抵文字之义，总归六书，故同为造字之本，然序不可紊。其最先者为指事、象形；有指事、象形而后有形声、会意；有四者为体，而后有转注、假借为用。故《汉·志》于四者皆曰“象”，而二者缀于后，与许君小异而大同，但世运变迁，而文字随之。据《说文解字序》云：周宣王太史籀

著大篆十五篇，已与古文或异。七国时以天下分裂，字尤异形。秦始皇时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时大发吏卒兴戍役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趋约易，古文由此绝。自尔秦书有八体：曰大篆，曰小篆，曰刻符，曰虫书，曰摹印，曰署书，曰殳书，曰隶书。汉兴有草书。孝平皇帝时，征沛人爰礼等百余人，令说文字未央廷中，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及新莽居摄，复改定古文，时凡六体，所谓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左书、缪篆、鸟虫者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云：“自仓颉迄于汉初，书经五变：一曰古文，仓颉所作；二曰大篆，史籀所作；三曰小篆，李斯所作；四曰隶书，程邈所作；五曰草书，汉初作。”秦废古文用八体；汉用六体，并稿书、楷书、悬针、垂露、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，因事生变也。魏世复有八分书。然自晋以后，楷书独盛行，其后遂为世所循用。此字数逐代增加——古少而今多——与其体变易——古繁而今简——之大略也。自古书契，多编以竹简；其用缣帛者谓之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东汉元兴中（和帝年号）宦者蔡伦乃造意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从用焉，谓之“蔡侯纸”（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）。及唐末益州有墨版；蜀相毋裔请用以刻九经；宋景德中（真宗年号）又及于诸史（详见焦竑《笔乘》）。由是印刷之业兴而版本出。明中业复有活字版。此文籍流布、其术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。

若是，则今日宜文学发达，远迈古初矣。而考其实乃有大谬不然者，何也？间尝推寻其故，然后知今之字数孳乳而寔多，其体又视古日歧，迨至楷书通行，而去之也益远。凡古之浑浑灏灏噩噩之文，在当日不难家喻户晓者，今则虽老师宿儒，欲求其融洽贯通，非竭毕生之力，不能得其涯涘。故古者以同而易，今以歧而难。此其一也。今之缮写印刷，视古为便。凡古人之著于竹帛者，类皆众所宗仰之书；匪是，则杀青无日。职是之故，虽汉之贾（谊）、晁（错）、董（仲舒）、刘（向），其所纂述多者百余篇，少乃五六十篇，或十数篇，或数篇；今则村塾学究，坊市贾客，亦皆著书镂板，自命通才，虽捋扯恒钉，率尔成章，然以当于庸俗之心，遂致不胫而走，汗

牛充栋，涉览殊艰。故古者以少而专，今以多而纷。又其一也。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：欲由今溯古，以通其训诂，必自识字始。夫古者大篆且群以为异于古文，今虽小篆尚觉近古，故《说文》一书，自当与《尔雅》同资研究，庶几可知古人造字根源，若者为本义，若者为引申义，若者为假借义，而经典之奇字奥句，可以渐通矣。试观古今文家，如李斯有《仓颉》七章，司马长卿（相如）有《凡将》篇，扬子云有《训纂篇》八十九章，班孟坚（固）复续十三章，而段氏玉裁《说文注》引其中所载孔子以下数十家之说，皆深于文事者。唐韩退之尤兢兢于此，故其言曰：“凡为文辞，宜略识字。”

（《蝌斗书后记》）又曰：“文从字顺各识职。”（《樊绍述墓志铭》）近世湘乡曾文正公（国藩）论文，亦以“训诂精确”为贵（《日记》）。可见欲文章之工，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。曩时巴县潘季约（清荫）为永朴述南皮张文襄公（之洞）督学四川日，每谆谆以此训后进，以为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。及任满旋京，成都门人武抑斋孝廉（谦）问：“治《说文》如何致力？”公告以人门之法曰：“试取许君五百四十字部首，记其形体，审其音读，究其训解，殫数十日之力，往复熟习，必期一睹其字。即能读为何音，辨为何义，并闭卷而能默写其字体，一一无讹，再与言第二事。”其论至为切实，可备学者之取资。若夫欲从数百千万卷中，撮其英华，去其糠粃，非知所抉择不可；欲知所抉择，非有真识不可；欲有真识，非有师承不可。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，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。昔吾家惜抱先生（鼎）尝谓己才弱，而《上刘海峰先生（大櫨）书》，则言“所赖者，在于闻见亲切，师法差真”，意正如此。夫古今集部，浩如烟海，究之足以名世者，每朝不过数人。六经、周秦诸子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姑勿论；近世古文选本，莫善于姚氏《古文词类纂》、曾氏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。二书自六朝以前人外，其以为圭臬者，惟唐荆川（顺之）、茅鹿门（坤）所定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姚氏益以元次山（结）、李习之（翱）、张横渠（载）、晁无咎（补之）、归震川（有光）、方望溪（苞）、刘海峰数人；曾氏益以元次山、陆敬輿（贇）、李习之、范希文（仲淹）、司马君实（光）、周（敦颐）、程（灝、颐）、张（载）、朱四子、范茂名（浚）、马贵与（端临）、归

震川、姚惜抱十余人。骈体文选本莫善于李申耆（兆洛）《骈体文钞》。其所录者，自秦以迄于隋而已。古今体诗选本，莫善于王阮亭（士禛）《古诗选》、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、姚氏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、曾氏《十八家诗钞》。王、姚所列入者较多。曾氏所谓“十八家”，曰曹子建（植），曰阮嗣宗（籍），曰陶渊明（潜），曰谢康乐（灵运），曰鲍明远（照），曰谢玄晖（朓），曰王右丞（维，官终尚书右丞），曰孟襄阳（浩然，襄阳人），曰李太白（白），曰杜工部（甫，晚依严武于蜀，表为工部员外郎），曰韩昌黎（愈，南阳人，先儒谓在修武，然文集每自称昌黎，盖祖居之地），曰白香山（居易，居东都履道里，构石楼香山，自称香山居士），曰黄山谷（庭坚，尝游皖潜山山谷寺石牛洞，乐其林泉之胜，因自号山谷道人），曰陆放翁（游为参议官于蜀，以与蜀帅范成大文字交，不拘礼法，人讥其疏放，因自号放翁），曰元遗山（好问）。盖鉴别皆极精审。吾人从事兹学，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，余则归诸涉猎之中。又其次者，虽不观可也。果如是，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矣。

或曰：文章特一艺耳，沾沾自喜何为？曰：否，不然。凡以文学为一艺者，不过本孔子“文莫，吾犹人也；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与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（《学而》）诸语耳。然孔子之意，盖以行为文之本，非谓有行即可无文也。使其如此，何以“四教”以文为首（《述而》），而畏于匡，且曰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（《子罕》）？昔李习之《寄从弟正辞书》云：“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。夫所谓一艺者，乃时世所好之文，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。其能到古人者，则仁义之辞也，恶得以一艺名之哉？”斯言可谓谛当。然则，北齐颜黄门（之推）谓“自古文人多陷轻薄”（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）、宋陈忠肃公（瑾）谓“一为文人便无足观”者，皆所谓时世所好之文耳；夫岂可漫无区别，而举古人所藉以继往圣、开来学者，一概轻视之耶？或又曰：当今时事孔亟，所应讨论者至多，奚暇及此？曰：否，不然。子独不闻“国与天地必有与立”之说乎？夫国之所藉以立，岂有过于文学者？匪惟吾国，凡在五大洲诸国，谁弗然？盖文字之于国，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，中可以合大群而

激发其爱国之念，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。关系之重如此，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，能及全球，时以自诩；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，殊不可解。夫武卫者，保国之形式也；文教者，保国之精神也。故不知方者不可与言有勇。且语言发于天籁；文字根于语言，则亦天籁也。既为中国人，举凡各种科学，非得有中国文字阐明之，乌能遍行于二十二行省？是故欲教育普及，必以文学为先；欲教育之有精神，尤必以文学为要。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。如曰“精深高古之文。势不能尽人皆知之、皆为之”，此则别有办法，盖分为普通学、专门学是也。何谓普通学？但求其明白晓畅，足以作书疏应社会之用可矣。何谓专门学？则韩退之《答李翊书》所谓“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”是也。大抵中小学校与夫习他种专科，能有普通文学，已为至善。若以中国文学为专科，岂可自画？昔王介甫（安石）《答孙长倩书》云：“古之道废踣久矣。大贤间起废踣之中，率常位卑泽狭，万不救一二，天下日更薄恶，宦学者不谋道、主利禄而已。尝记一人焉，甚贵且有名，自言少时迷，喜学古文；后乃大悟，弃不学，治今时文章。夫古文何伤？直与世少合耳，尚不肯学，而谓学者迷；若行古之道于今世，则往往困矣，其又肯行耶？”惜抱先生《复鲁絜非书》亦谓古今才士，苟有为古文者，必杰士。今当斯文绝续之交，诸君负笈而来，有志兹学，是不以为迷也，使犹不以杰士相期，则吾岂敢！

根 本

《左传》云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，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（襄公二十五年）此孔子尚文之说也。然《论语》又云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夫质者，文之本也。《礼记》云：“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”（《礼器》）是文与本固相须为用也。而本尤为要。故《孟子》云：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。”（《离娄》）呜呼！是岂独为立身行己言之哉！苟欲文之工，亦非此不办耳。此韩退之所以云：“本深者末茂。”

（《答尉迟生书》）又云：“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。仁义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昔荀子（况）云：“君子之学也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体，形乎动静。端而言（端读为喘），蠕而动，一可以为法则。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口耳之间，则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！古人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学也，以为禽犊。”（《劝学》）扬子云《法言》云：“古者之学，耕且养，三年通一；今之学也，非独为之华藻，又从而绣其鞶帨。”（《寡见》）王仲任（充）《论衡》云：“有根株于下，有荣叶于上；有实核于内，有皮壳于外。文墨辞说，士之荣叶皮壳也。实诚在胸臆，文墨著竹帛，外内表里，自相副称。意奋而笔纵，故文见而实露。”（《超奇》）徐伟长（干）《中论》云：“圣人因智以造艺，因艺以立事。艺者，德之枝叶；德者，人之根干也。二者不偏行，不独立。木无枝叶，则不能丰其根干，谓之疵，人无艺，则不能成其德，故谓之野。若欲为君子，必兼之乎。”（《艺纪》）颜氏（之推）《家训》云：“夫学者，犹种树也，春玩其华，秋登其实。讲论文章，春华也；修身利行，秋实也。”（《勉学》）凡此诸说，皆发明孔子文质相须之旨者也。要之此意，《易·贲卦》已详言之。案《贲》之“九三”曰：“贲如濡如，永贞吉。”夫“贲者，饰也”（《序卦传》）。曰“濡如”，则饰之甚也。然而曰“永贞吉”，则惧其灭质也。故“上九”又曰：“白贲无咎”。白者，无色之谓。（《杂卦传》）所以勉其敦本务实也。苟敦本务实，而文乃不为空言矣。古今鸿篇巨制，永垂不朽，端在乎此。夫岂有徒骋其词藻，而可以立诚居业者乎？

是故为文章者，苟欲根本盛大，枝叶扶疏，首在于明道。夫明道之旨，见于《中庸》，孔子所云“道之不明，我知之矣”是也。其后董子（仲舒）亦有“明道不计功”之语。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盖自成周大司徒“以乡三物教万民，而宾兴之”，一曰六德，二曰六行，三曰六艺。而乡大夫、州长、党正以下，书而考之者，皆不外于德、行、道、艺四者。（并《周礼·地官》）德者，有诸身之谓；行者，著于事之谓；道为之本；而艺其末也。孔子讲授，一遵成周之旧，故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

于艺。”（《述而》）降及周末，此风已微，然诸子中最醇者孟氏，次则荀卿，韩退之《送孟东野序》所谓“以道鸣”者也。他若杨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婴、老聃、庄周、申不害、韩非、慎到、田骈、邹衍、尸佼、孙武、苏秦、张仪之属，退之谓为“以其术鸣”，是诚精确。然就其术之长者，要未尝不包于道之中，犹不致华而不实也。两汉以后，醇儒虽少，然亦各有所明，至魏晋乃弥衰矣。是以退之云：就其善鸣者，“其声轻以浮，其节数以急，其词淫以哀，其志弛以肆，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。”隋初遂有以华艳之词人章奏者，文帝以付有司治罪。而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曰：魏之三祖（魏武帝为太祖，文帝为高祖，明帝为烈祖）崇尚文词，遂成风俗。“江左齐梁，其弊弥甚”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之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。以儒素为古拙，以词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。良由弃大圣之轨模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

王仲淹（通）告门人亦云：“学者博诵云乎哉，必也贯乎道；文者苟作云乎哉，必也济乎义。”（《中说·天地》）盖皆灼见当时之弊。幸韩昌黎出，乃作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等篇，而八代之衰以起。其《答李翊书》云：

“能如是谁不乐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，况其外之文乎？”《答尉迟生书》云：“愈所能言者，皆古之道。”《答李秀才书》云：“愈之所志于古者，不唯其辞之好，好其道焉尔。读吾子之辞，而其得所用心，将复有深于是者，与吾子乐之，况其外之文乎？”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云：“愈之为古文，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？思古人而不得见，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。通其辞者，本志乎古之道也。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。”由是其门人李南纪（汉）作《昌黎集序》，遂有“文者贯道之器”之说。此外如柳子厚（宗元）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云：“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、务采色、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”《报崔黯秀才书》云：“圣人之言，期以明道；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；辞之传于世者，必由于书。道假辞而明，辞假书而传。”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云：“秀才志于道。道苟成则勃然尔，久则蔚然尔。”宋柳仲涂（开）《应责》云：“天生德于人，圣贤异代而同

出，岂以汲汲于富贵，私丰于己之身也？将以区区于仁义，公行于古之道也？己身之不足，道之足，何患乎不足？道之不足，身之足，则孰与足？”穆伯长（修）《答乔适书》云：“夫学乎古者以为道，学乎今者以为名。道者，仁义之谓也；名者，爵禄之谓也。然则，行道者有以兼乎名；守名者无以兼乎道。有其道而无其名，则穷不失为君子；有其名而无其道，则达不失为小人。与其为名达之小人，孰若为道穷之君子！矧穷达又各系其时遇，岂古之道有负于人耶？”欧阳永叔（修）《答吴充秀才书》云：“圣人之文虽不可及，然大抵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也。”又苏子瞻《祭欧阳公夫人文》述公语云：“我所为文，必与道俱；见利而迁，则非我徒。”曾子固（巩）《赠黎安二生序》云：“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；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。”又《答李治书》云：“夫道之大归非他，惟欲其得诸心，充诸身，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，非汲汲乎辞也。”司马君实《迂书》云：“君子有文以明道，小人有文以发身。”周子《通书》云：“文所以载道也。轮辕饰而人弗庸，徒饰也，况虚车乎？文辞，艺也；道德，实也。笃其实而艺者书之，美则爱，爱则传焉。贤者得以学而至之，是为教。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，师保勉之，不学也，强之，不从也。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，艺焉而已，是皆以道为文之本之说也。”

其次在于经世。自《易·屯卦》言“君子以经纶”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因有“《春秋》经世先王之志”之语。然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六经大义，何一不以经世为归？即其后九流十家，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驰说于世。而据《庄子·天下》篇，论六艺云：“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则亦圣人之道之支与流裔。是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，道家出于史官，名家出于礼官，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，法家出于理官，墨家出于清庙之守，从横家出于行人之官，杂家出于议官，农家出于农稷之官，小说家出于稗官，而总论之曰：“使其人遭明王圣主，得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已。”然则，学虽有纯有驳，要之大旨皆主于经世可知。两汉人才，无如贾、晁、董、刘、诸

葛，其奏议固在于指陈时政，即相如之词赋，太史公以为“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讽谏何异？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）则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实与《谏猎书》相表里，即《封禅文》亦然。先姜坞府君（讳范）所以谓“设意措辞，皆翔蹶虚无，非诞妄贡谀者比也”，又何得谓无裨于世？唐宋之间，陆宣公固当首屈一指；他若韩退之，欧阳永叔、曾子固、苏子瞻、王介甫之文，李太白、杜子美（甫）、白乐天（居易）、黄山谷、陆务观（游）之诗，亦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兢兢。延及近代，如归、方、姚、曾辈，非有数篇关系天下万世文字，何以称作者？昔《论衡·自纪》篇云：“为世用者，百篇何害？不为用者，一章无补。”王介甫《上人书》云：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；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，不必适用；诚使适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，以适用为本，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。”又《上邵学士书》云：“某尝患近世之文，辞弗顾于理，理弗顾于事，以襞积故实为有学，以雕绘语句为精新。譬之撷奇花之英，积而玩之，虽光华馨采，鲜缛可爱，求其根柢济用，则蔑如也。”程子《答朱长文书》云：“圣贤之言，不得已也。盖有是言则是理明，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缺焉。如彼耒耜陶冶之器，一不制，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。圣贤之言，虽欲已，得乎？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，亦甚约也。后之人平生所为，动多于圣人，然有之无所补，无之无所缺，乃无用之赘言也。不止赘而已；既不得其要，则离真失正，反害于道必矣。”昆山顾亭林（炎武）《日知录》云：“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，曰明道也，纪政事也，察民隐也，乐道人善也。若此者，有益于天下，有益于将来，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。若夫怪力乱神之事，无稽之言，剿袭之说，谀佞之文，若此者，有损于己，无益于人，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。”又云：“张子有言：‘民吾同胞’。今日之民，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。救民以事，此达而在上者之责也；救民以言，此穷而在下者之责也。”又《与友人书》云：“昔人谓‘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’。夫《春秋》之作，言焉而已，而谓之行事者；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，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。愚有见于此，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、当世之务者，一切不为。”如以上数条所言，庶几得文

章之要领也欤！

要而言之，吾辈苟从事兹学，必先涵养胸趣。盖胸趣果异乎流俗，然后其心静；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，然后可以商量修、齐、治、平之学，以见诸文字，措诸事业。否则，虽告以文章为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彼乌从而知之？即知之，乌能允蹈之？然欲涵养纯粹，非用力于退之《答李湘书》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”二语不可。考黄山谷《答秦少章书》云：

“二十年来，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，卓尔名家者则未多。盖深思其故，病在欲速成耳。夫四时之运天德也，不能即冬而为春，断可识矣。”窃谓此可作“无望其速成”句注脚。苏东坡《与李方叔书》云：“私意冀足下积学不倦，落其叶而成其实。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，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。若进退之际，不甚静慎，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之益，而于名节有邱山之损矣。”此可作“无诱于势利”句注脚。若夫惜抱先生《答鲁宾之书》云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吉人之辞寡。’夫内充而后发者，其言理得而情当；理得而情当，千万言不可厌，犹之其寡矣。气充而静者，其声闳而不荡；志章以检者，其色耀而不浮。邃以通者，义理也；杂以辨者，典章名物。凡天地间之所有也，闳闳乎聚之于锱铢，夷恻以善虚，志若婴儿之柔，若鸡伏卵，其专以一，内候其节而时发焉。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。故文之至者通乎造化之自然，然而骤以几乎合之则愈离。今足下为学，在于涵养而已。声华荣利之事，曾不得以奸乎其中，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，其必有以异乎今而达乎古也。”此则更融会韩、柳之旨而总论之，开示后人，尤为周密。又歙县吴殿麟（定）《与友人论文书》云：“为文章者，若不于六经诸史根本是求，而惟末之务，乃欲无一言一字见疵于人，自古及今，盖未之见也。”嘉兴钱衍石（仪吉）《与弟警石（泰吉）书》云：“凡为文章者必先有‘知言’、‘养气’工夫。若制行动辄乖谬，而谈理欲其切实，出言不免杂乱，而操笔欲其简净，岂不大难！”曾文正公《日记》云：“杜诗、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，彼自有‘知言’、‘养气’工夫。惟其知言，故常有一二见道语，谈及时事，亦甚识当世要务；惟其养气，故无纤薄之响。”语皆亲切有味，汇录于此，以为好学深思者之一助焉。